

文史资料选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四十六辑

- 我和北平《解放》报..... 于光远
- 我的漫画生涯（下）..... 李滨声
- 烈士沈荇之死..... 冯国定
- 在惇亲王府里度过
的青少年时代 爱新觉罗·毓 岳
- 旧京荷花市场与盂兰盆会..... 常人春

北 京 出 版 社

文史资料选编

第四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 京 出 版 社

(京) 新登字 200 号

2046/4

文 史 资 料 选 编
WENSHI ZILIAO XUANBIAN

第四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广益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0千字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440

ISBN 7-200-01884-8/K·189

定价: 4.10元

我和北平《解放》报于光远 (1)

一场特殊的战斗

——北平《解放》报的片断回忆.....刘振民 (18)

难忘的 1946 年

——《解放》报和《新华社新闻稿》的编发工作.....孙 政 (34)

难忘的报童生活邢锦棠 (44)

我的漫画生涯 (下)李滨声 (54)

北昆老艺术家朱 复 (110)

昆曲首次赴日演出

——马祥麟先生往事回忆.....刘东升 (118)

从哈尔飞到西单剧场.....侯希三 (128)

烈士沈荃之死.....冯国定 (157)

1945 年——1948 年“北平市总工会”

的活动概况.....辛 生 (176)

在惇亲王府里度过的青少年

- 时代.....爱新觉罗·毓 岳 (223)
- 京郊清代公主坟冯其利 (233)
- 旧京荷花市场与盂兰盆会.....常人春 (271)
- 什刹海佚闻.....石 朱 (293)
- 大酒缸的风情.....石 朱 (297)

我和北平《解放》报

于 光 远

文章的题目写成这样，是费了一番斟酌的。我曾经想用“我和《北平解放报》”为题。当时延安《解放日报》两个称呼都使用过。但是最后我还是主张使用“北平《解放》报”——即在书名号内只写“解放”两个字，而把“北平”和“报”都放在书名号外。这样写表明，我们说的是一张报纸，它的名称是《解放》，发行地点是在

五期星

調劑本市糧荒

張垣糧食繼續運平

【本報專訊】張垣口裕民食糧公司，於前年
前分派白麵小麥高粱等三十萬斤赴平，調劑平
市糧荒。該項糧食，現已大部售出，第三批亦

解 放

刊 日 三

號 一 第 日 二 十 二 月 二 年 五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記 登 請 中 已 刊 本 號 一 十 四 開 報 道 三 四 西 平 北：處 行 發 時 臨

國 十 二 幣 法 價 定 份 每 社 刊 自 三 報 解：者 行 發

五期星

五、解放與交通的關係
六、中共發言人脫離我黨政治
——蘇州鐵路存在不容忽視
七、東江鐵路與蘇州歷史
八、新聞界的責任
九、隨筆與黨報實踐的真相

光榮北平

……

……

……

……

國 中 新 設 建 結 團 主 民 平 和

—— 刊 發 ——

向，也是已

……

……

……

……

“北平”，这个称谓最准确。只要看一下版面，就可以看到，报头上只有“解放”两个字。在三日出一期时，下面有“三日刊”、两日出一期时下面有“双日刊”三个字。这报从来没有出现过《北平解放报》的报头。

在这篇文章的题目中不使用《北平解放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从1949年3月开始，出过一张以《北平解放报》为名的报纸。出了4个多月。情况是这样的：1949年初，北平解放了。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这个城市还没有被定为首都。从这一年的2月2日起，在邯郸出版的、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就在北平办了一张《人民日报》（北平版）。3月决定在北平办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于是决定《人民日报》（北平版）出到3月14日为止，3月15日起改出《北平解放报》。新出的那期《北平解放报》未作为该报的创刊号，而是继承《人民日报》（北平版）作为报纸的第42期。原来《人民日报》（北平版）的订户改送《北平解放报》。3月15日《北平解放报》有一则“本报重要启事”，把这些情况交代得清清楚楚。这张报纸办到1949年7月31日。在这一天的报纸上宣布翌日停刊。既然有了这样一种《北平解放报》，我现在为之写回忆录的在1946年创办的这张报纸就更不应该使用《北平解放报》这个名称了。1946年在北平，党中央办的这张报，报头上“解放”两字就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题写的这个报头中的“解放”两字。1949年《北平解放报》这五个字不知是谁写的，但可以肯定，不是毛泽东的手迹。

两张在北平办的党报的名称，现在我只是从写法上区别了开来，而在读音上还是相同的。这是没有办法的。这两张报纸存在的时间都很短，都只有4个多月。两张报纸都是四开报，使得它

们很容易相混。建国后不久，一次我在书店看到《北平解放报》的合订本，我误以为是“北平《解放》报”，花了二十块钱买了4本，至今我还保留着。而我参加编辑的“北平《解放》报”却至今只能到图书馆去查阅。延安《解放日报》的原版报，我和王惠德同志收集齐全后影印了许多份，使用起来比较方便。我希望有关方面能够支持一下把“北平《解放》报”也能影印若干份出版。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还考虑过使用“我与《解放三日刊》《解放双日刊》”这个题目，但很快地被我否定了。因为当时我们要办的不是三日刊或者双日刊，而是日报，三日刊和双日刊只是过程中的产物。我记得在我到达北平第一次见到李克农领任务，谈起这张报纸时，李讲，随着整个形势的发展，党准备把重庆《新华日报》搬到北平。李说，党中央不会老在延安，《解放日报》也不会老在延安办。我们党的力量主要在北方。解放区包围着北平。在北平这个中心城市办报最好。当时李没有讲这是中央的意图，也没有讲这是哪一位中央领导人讲的话。我也没有去考虑这是不是他个人的看法，反正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李讲的是很自然的道理，我自己也是按照这样的思想去行动的。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些人的工作是给延安《解放日报》搬到这儿来打前站。所以报头也就用延安《解放日报》上毛泽东写的那两个字。我们的工作步骤也就是先出两三个月的三日刊，再出两三个月的双日刊，然后就出日报。而在出双日刊时，我们也的确编过一期北平《解放日报》的试刊。从当时我们的工作目标来说，可以说是为北平《解放日报》的创刊做准备工作。可是我也不能把文章的题目写成“我和北平《解放日报》”。因为毕竟这张报纸没有办成日报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扼杀了。所以斟酌来斟酌去，最后还是确定成现在这个样

子。

在这里还想讲一件事：当初在报社大门前挂了牌子没有？如挂了，挂的是怎样的牌子？对这一点我的确记不清了。大概在一年前，我在刊物上看到一张在我们报社门前挂有“解放日报”招牌的照片。而且我记得很清楚牌子是竖写的。这张照片登在什么报刊上，我也记不起来了。现在我想，照理应该有招牌。当时如有招牌，也不可能挂“三日刊”或“双日刊”，只有挂“日报”。我想这样的照片不难找到。（注：1946年在北平《解放》报和“新华社北平分社”工作过的老人，曾经在1990年12月19日一起聚会过一次。我趁这个机会询问有谁知道这张照片。在座的杨林讲，的确有这张照片，而且是他拍摄的。他说，在5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勒令封闭北平《解放》报，叶剑英同志去方壶斋九号慰问报社和新华社分社人员，后来叶剑英同志走到大门口，手指着这块牌子说话时，杨就拍下了这张照片。在叶帅逝世后，这照片登在报纸上。这样就更容易查了，据说童小鹏也拍摄了不少照片，其中不知有没有这样的照片？）

在这里我还想提出一个希望：查清楚当初确定这张报纸的报名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何时、何地、何人在场，根据何种考虑，经过怎样的讨论等。当时我不在延安，不知道这些情况。我只知道决定报纸名称这件事不是在北平办报的同志讨论决定的，从时间上看，报纸名称也是一开始筹办报纸时就定了下来的。要弄清楚这个过程，只有靠查档案和向当事者作调查。希望能够找到档案和当事者有比较清楚的回忆。照道理，在报社内部对于报名问题应该有几句传达，应该有一些议论，我也应该能够提供一些回忆，可是我的记忆太模糊了。也许同志们能够帮助我把这些

回忆起来。

在写我所了解的、现在还能记得起来的、关于“北平《解放》报”的事实材料之前，我想先交代这么几句话。

“北平《解放》报”社和新华社北平分社在同一座建筑物里办公。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机构，各有各的任务，新华社还有它的垂直系统——统一的编委会。这个编委会的主任是钱俊瑞，副主任是姜君辰。其余的三个编委是杨庚（他负责新华社北平分社）、郑季翘（他是报社的编辑部主任）和我（我是研究室主任）。这5个编委中的4个人已相继去世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活着。但是我对新华社分社工作的情况并不很了解。我只知道分社的同志们利用办报的条件四处采访，联系北平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若干知名的民主人士，了解情况，向总社发报。现在其他的编委都去世了，我也有责任尽可能努力去回忆新华分社的情况，但是能回忆得出来的仍很少。就是我比较熟悉的报社工作甚至我主管的研究室工作，现在我也说不出很多的事情来了。当然，我写这一段历史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我是最早到北平来筹办这张报纸的人，并且我始终坚持这项工作，直到报纸被封闭、报社和新华社全体人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押送出境时为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应该为研究这一段历史详细地提供事实材料。在发起对这段历史作研究时，同志们商量，由一个专门的小组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和写作，而我们这些当时在报社和新华分社工作的人则凭借自己的记忆提供素材。因此以下是完全凭记忆来写的。既然是素材，也就不怕零零碎碎。45年前的事能够记得起来的，本来就不多，因此记得起来的事情点点滴滴都不想丢掉。有些自己不知

道但觉得为研究所必须应努力去了解的事情，如果有什么线索或者有些建议，我也想写一下，但是我不想去作什么分析和判断，这样的工作就留给参加研究这段历史的那个专门小组的同志去做了。

现在就从我本人出发来讲有关的事实。从1939年7月下旬起，6年多的时间里，我没有离开过陕甘宁边区。日本投降后，1945年11月，我随着延安大学的大队徒步出发离开延安。第一个目标是张家口，最终的目标是东北解放区。年底到了张家口，听说去东北的道路上不很安全，决定延大的干部在张家口暂做停留。就在我刚到张家口不久，刚过年，组织上传达了延安来的指示，要我立刻去北平筹办一张党报。当时接到这样指示的人只有我一个，传达的内容也就这样简单，具体做法只好到北平去问。我想我在北平有亲戚和老师同学这样的社会关系可以利用。走前我又在张家口的朋友中打听还有什么可以利用的可靠的社会关系。结果原先在中国自然科学学院工作的聂春荣介绍了他的一位姓孟的表弟，他在前门外打磨厂开了一个字号。还有人给我介绍建国后曾担任台盟主席的苏子衡教授的夫人甘莹，说她正在北平，也可以帮我的忙。还有人托我到北平后看望她（他）们的亲属等等。我在张家口略略做了点准备工作之后，就坐军调处执行部的飞机前往北平。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它很小，只能坐八个人左右。那天刚上飞机时，只有伍云甫和我等三人，起飞前听说还要等国民党方面的人上飞机。等了很久，最后送上了三具棺材，里面装的是在张北翻车死去的三名国民党的报务员。到北平后，我找到了党组织，请示如何工作。我记得同我谈话的是李克农同

志。李让我：(1)在北平设法买到比较多的新闻纸，保证出报后的纸张供应和联系肯承印报纸的印刷厂；(2)了解北平居民的思想状况，了解他们的感情，便于报纸更好地适应居民们的要求。李还告诉我，报纸的名称用“解放日报”。前面我写的李克农的那些话，就是第一次他见我时讲的。到北平后我就明确地知道李是我们这项工作的上级。

我到北平后，最初住在翠明庄。我立刻开始活动。我的活动分两方面进行：一是了解北平社会。我除了儿童时期在北平住了三年外，还在这个城市上过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抗战前我在中华解放先锋总队部工作。我对这个城市比较熟悉。可是我从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的当天离开北平后，有八年半没有到过这个城市了，我对曾在日本统治下长期生活和国民党接收了几个月的北平居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全不了解。于是我就去找亲戚和老师同学。我的舅父、舅母、姨妈，以及好几个表姐妹，在这八年中他们没有离开北平。老师和同学中也有的人一直在沦陷区，有的人是国民党接收北平后来到这个城市的。在同他们的接触中，我了解到他们都想什么、怕什么。我接触到的人思想状况当然是不一样的，但当时大多数青年，受国民党宣传的影响，对党的土改与清匪反霸政策，对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摩擦，对苏联红军在东北驻扎等等的看法也还不那么正确。我有一位表妹同国民党的学生组织关系比较密切，曾让她把我带进一个充满反苏反共气氛的集会（这个会是在中山公园里中山堂举行的）上，使我亲自看到听到国民党反动派如何向接受他们影响的人作反共反苏的煽动，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如何感情冲动。我在访问清华大学化学系老教授张子高时，有一位辅仁大学教授前来

访问张教授。他不知道我的身份，在同张的谈话中，他对解放区和我们党内的情况造了一大通谣言。我根据事实对他进行驳斥，这时，张教授才介绍说，我是从解放区来的，这使他很狼狈。也就在那个时候，北平学生进行了一次人数相当不少的反苏反共游行示威，而我住的翠明庄是游行示威的最重要的一个地点。那一天我在翠明庄屋顶平台上看下面游行者的精神状态。我观察后得到的印象是，大多数游行者是受了欺骗的。他们中有不少人真有不小的反苏反共的劲头。我同一起观看的一位同志说，将来游行中不少人要求加入我们党时，少不了要对今天他（她）的行为写一段检查。后来我果真遇到了好几个这样的人。以上我说的是《解放》报创刊前的情况。没有多久，群众的思想情绪就发生了对我们党有利的变化。

我活动的第二个方面是，悄悄地买到了当时来看不算太少的新闻纸和在西直门内找到承印共产党报纸的印刷作坊（东方印刷厂）。我也去过那里，那是在新街口一个坐北朝南的铺面里。我在这方面的活动，得到了那位在打磨厂开设字号的孟掌柜和甘莹同志的不少帮助。报社的用房我看了几处，不是房间太少，就是要价太高，没有买成（其中有一处就在现在新华社大楼所占用的土地范围之内）。也就是在这个期间，张家口方面来了消息，说是晋察冀解放区法院阮慕韩在北平有一所屋子，可以提供报社使用。这就是后来报社发行部的所在地——西四三道栅栏 41 号。得到这个信息后，我也去看了一下。这是我们自己的房子，不用花钱去买，而且立刻就可以用。阮慕韩帮了我一个大忙。现在这所房子的产权还是属于阮慕韩的后代的。不久前，我为这所房子曾为党所使用作了证明。在从事这些活动时，我当然不好打出《解

放》报的旗子，而是在街上印了一张重庆《新华日报》社秘书头衔的名片（在国民党统治区，“秘书”这个头衔是不小的，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把这样的名片给人，人家看了，脸上往往有一种特别的表情。北平同重庆不一样，居民们很少看到共产党人，总想多看几眼共产党员是个什么样子。

我活动的第三个方面，是联系一些人到报社，据孙政回忆，他在1946年1月10日左右到《解放》报社工作时，是我在“中外出版社”同他谈的话。中外出版社是孟用潜等人在北平时搞的。1946年我到北平后很早就找到了他。我和孙政的那次谈话，从我这方面来说，就是孟用潜安排的。

我是1946年1月初到北平的。具体的时间记不清了。我在北平单独活动的时间不长。经过若干天，从解放区调来的同志陆续到了北平。我一个人力量很微薄，可以说只是打了个前站。人越到越多，工作就逐步走上正轨。

北平《解放》报和新华社北平分社人员的来源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来源是张家口。从张家口来的人又主要是原先延安大学的干部。延大干部到了张家口之后，前往东北的道路受阻，暂时困在张家口，而张家口离北平又很近，其中一些人很自然地就成为调去北平的对象。姜君辰、马乃庶、余修、王康、王宗一、何洛、杨进琳、刘振民等都是延大的干部。除延大干部外，晋察冀中央局还支援北平好几位干部。郑季翘原为中央局研究室主任，郑仓夷原为《晋察冀日报》的记者，都调到北平。

第二个来源是延安。从延安来的大多数是清凉山的干部。余宗彦、张沛、刘稚农、祝志澄等都是从延安来的。我在北平遇见

延安来的人，跟他们开玩笑说，我从延安到北平，走了二十多天，才到张家口，你们只飞了几个小时，占了很大的便宜。

第三个来源是山东。山东《大众日报》和《晋察冀日报》有责任支持北平《解放》报。钱俊瑞和他的夫人何文就是从山东到北平的，丁九、舒翼翠等就是山东《大众日报》社的。

除这三方面的人和重庆来的、东北来的等等以外，还有从北平当地吸收的。我建议编写组发一张表给现在能够取得联系的报社和新华社的老人，请他们回忆是何时从何处调到北平的，调到北平后担任什么工作。这样像上面那样的叙述就可以准确和完整得多。现在我做不到这一点，我连杨庚是从哪个单位调来的也记不清了。钱俊瑞和姜君辰到职的时间我说不清楚。在我的记忆里，姜君辰到北平的时间要早一点。方壶斋九号这所房子就是姜以“实业家”的身份与卖方签约的。（签约时的“中人”是宣外的警察局局长。以后知道这房子被共产党用来办报之后，听说他也相当被动。）

整个说来，报纸没有筹办很久，在1946年2月22日就创刊了。在创刊时，报社、新华分社的人员虽然尚在补充之中（三月份有比较多的人调进），但是组织已经比较健全了。报社和新华分社合在一起的编委会成员和分工的情况，在前面我已经提到过了。新华分社的记者也就是报社的记者，对外活动用的是报社记者的名义，对总社发稿就是新华社记者，在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方面都同报社在一起。在方壶斋九号除了从事编辑工作、记者工作、研究工作的人之外，还有干部工作、行政工作的机构。除此之外还有经理部和发行部。发行部在三道栅栏，不在方壶斋。在方壶斋九号这座小小的楼房内集中居住和办公的人，在3月底就

达到 40 人左右。

我记得的编辑人员除郑季翘外，有余宗彦、田工、张沛、刘稚农、孙政等，记者除杨庚外有郑仓夷、丁九、张维冷、余修、肖殷（英）等。负责干部工作的是王康，负责行政工作的是马乃庶。负责经理工作的是孙敬文，负责发行工作的是马健民。

我负责研究室，研究室的情况我了解得具体一些。研究室内有几位是做研究工作的，当时没有“研究员”的职称，从工作性质来说应该称之为研究员。他们是王宗一、程钧昌、何洛、杨进琳等，在研究室内设有一个资料室，由舒翼翬负责。他带着岳旦、郝毅亭等几个人工作。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文化、社会的各方面，为报社写稿。资料室的任务是搜集资料，主要搞剪报。资料室订了许多报纸，把有用的材料剪下来，贴在裁好的报纸上。剪报的工作很紧张，短短的时间内剪贴了不少。因为这是花了劳动积累下来的，虽然不是什么保密的东西，在“四·三事件”后怕丢失，或者听到什么有人要来方壶斋捣乱的消息，就把这几个柳条箱转移出去，可是因为经常要用，所以形势稍微缓和又运回来。研究工作因为时间比较短，在我的印象里没有出多少成果。

报纸创刊后，在北平，不论上层国民党党政机关或是下层一般的市民都很震动。报贩在大街小巷叫卖“解放报”。那种情景，《解放日报》3月3日那篇《万余份供不应求，平市民热爱解放报》的报道完全是真实的情况。而北平国民党当局一开始就威胁报贩和读者，禁售这张报纸。国民党一位高级官员讲，共产党在北平办这张报纸相当于在北平驻扎一个师的部队。

下面我想写一点有关1946年“四·三事件”的事情。关于这个事情，当时延安《解放日报》有许多报道。我查了一下这家报纸，报道声援的文字有二十多篇，其中还有我写的一篇《特务现形记——“四·三”事件中的一个片断》，登在4月10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同志们在写回忆录时，也都会写，因此我就不详细地去描述这段历史了。不过，有一些片断过去未见报道，别的同志也许不知道的，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下。

方壶斋九号基本上是座两层楼的楼房。我说是“基本上”，因为在二层楼的上面还有几间“阁楼”，也是住人的。我的办公室和住房是在底层。我在《特务现形记》中描绘的我亲眼看到的情景——被抓住领口倒栽葱似的从楼梯上被揪下的人中，有一个就是姜君辰。来的军警宪特不少，在大家抵抗的情况下，要把所有的人带走的确是“兵力不够了”。（当时我是主张积极抵抗的，大家也都积极抵抗，因此许多被捕的人都是两个人架一个人地被拖走的。不这样就不会发生“兵力不足”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原先的打算，一是认为这里许多人既然来自解放区，总会有什么武器之类的东西可以搜查出来，因此可以找到用来封闭报社的借口。但结果没有查出任何东西；二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人都抓走，使得这件事在社会上不发生特别大的影响。可是我们这么一抵抗，就从半夜闹到天亮。在第一批同志被捕之后，我们又采取转入外线作战的办法，从室内走到大门口。许多人聚集在一起，大喊大叫，吸引众多市民来围观，形势就起了变化。同时向生活最苦、被迫到这里来抓人的警察和普通士兵做攻心工作。我们对士兵和警察说明，特务分子的行为完全是非法的，同时我们又向他们解释中国人民包括他们在内为什么这么贫穷痛苦的原因，向他们宣